

An abstract graphic at the top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grid of hexagons in shades of blue and purple. Overlaid on this grid are several white arrows pointing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some accompanied by small plus signs. The overall effect is one of 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flow.

XIN XI GONG KAI YU
NONG CUN XIN XI TI XI JIAN GOU

信息公开与农村信息体系建构

刘行芳 刘修兵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成果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信息公开与农村信息体系建构

刘行芳 刘修兵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息公开与农村信息体系建构/刘行芳、刘修兵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61-3177-0

I. ①信… II. ①刘…②刘… III. ①国家行政机关—信息管理—研究—中国②信息技术—应用—农村—研究—中国 IV. ①D630.1
②F3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547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 彬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2.75
插 页 2
字 数 385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由于众多原因，三农问题近年来变得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定、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甚至国际声誉的大事，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但解决三农难题应该从何处着手？国家、政府应该担当什么责任？有关部门该如何行动？农民自己该如何努力？全社会都在思考，答案也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各有道理，也各有不足。

一

解决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重要目标，是我国政府推动国家进步、解决社会矛盾、促进均衡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环节，是全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而紧迫的历史任务，更是亿万农民千百年来的热切期盼。我们认为，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以构建农村信息保障体系，发展好、实现好、维护好农民知情权为抓手，不失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便捷而有效的路径。

进入 21 世纪以来，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任务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中央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08 年一号文件强调，“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各级政府正在努力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种种证据表明，农民媒介素养低下、信息渠道单一、信息传播

滞后、信息缺乏带来经济贫困及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已经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保障农民知情权和构建农村信息传播网络已经历史地摆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理论工作者必须及时提供相应的学术支持,切实做好这件事事关发展稳定、人民福祉的大事。

在西方,关于公民知情权的研究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 and 较为完备的理论,但一般只研究满足公民知情权,缺少专题研究满足农民知情权的报道。20 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国内学者开始涉足农民知情权和农村信息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一批专家、学者、教授以及农业部专家组都有过卓有成效的研究,形成了一批有质量的学术成果,不少单位还组建了专门的研究机构,^①有的还组建了专业网站,^②整合社会资源,探讨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对维护我国农民知情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路和方法。当然,上述研究多在宏观层面思考公民知情权的法理依据和逻辑必然,而对维护农民知情权现实紧迫性的论述、工作难点、实现途径和信息网络建设还来不及深入,理论的系统性和操作的可行性还有待细化。因此,在十七大提出满足人民“四权”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保障农民知情权的问题,提出构建涉农传播信息网络的科学构想,已成当务之急,刻不容缓了。

二

研究维护农民知情权和构建农村信息保障体系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从理论上讲,第一,可以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新闻传播学方面的思路。三农问题成因很多,但农村处于信息孤岛状态、农民处于信息传播末端、他们的知情权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信息难以发挥作用无疑是重要原因。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带来的信息化,世代处于信息闭塞状态的我国农民不断被边缘化和弱势化。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三农问题日益突

^①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大众传媒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

^② 如中国农业部、中国农民网、三农中国网、中国农村研究网、全国社科院系统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网、中国农业门户网、中国农业信息网、农民教育在线等,据王汝林《涉农网站呈现多维快速发展格局》统计,截至 2009 年 1 月,我国涉农网站达 17822 个,但多数为农业经济信息网,涉农学术网则屈指可数。

出,农产品滞销、农民权益受损、农业经济脆弱问题加剧,引人关注。因此,从理论上阐明如何提供信息保障,满足农民知情权,推动三农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显得格外紧迫。第二,为保障农民知情权提供理论依据。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被打破,满足农民知情权成为提升农民政治地位的主要手段。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生活日益富裕,国家实力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农民知情权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中国传媒产业发展趋势分析》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现有报纸 2119 种,期刊 9074 种,电台 282 座,电视台 314 座,WWW 站点 668900 个,^①但以“三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却屈指可数。以淮海经济区为例,该区(由鲁南、苏北、皖北、豫东 20 个地级市组成)面积 17.8 万平方公里,人口 1.2 亿,2010 年全区 GDP 达 18600 多亿元,现有正式登记的报纸 50 家,年发行量近 300 万份,这个数量看似不少,但平均每人每年只能读到 0.025 份报纸。农民信息缺失究竟到了何种程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给予理论上的回答。第三,为构建通畅便捷、运行有序、低成本高效率的农村信息传播网络提供理论模型。保障农民的知情权是时代提出的新要求,但是,如何构建涉农信息传播网络?各部门的责任如何划分?怎样保证信息传播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些问题都需要做出科学的回答。

从实践上讲,其意义更加显得重要。第一,通过研究,探索建立涉农信息保障的制度途径。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西方已有相对成熟的法律保障。1775 年,瑞典率先提出“公开原则”,规定政府文件应向公民公开。1840 年和 1908 年,英国先后公布议会法案,规定对进入议会采访的记者给予方便和保护,地方长官召开的行政性会议,允许记者旁听和发布新闻。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与后来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共同组成国际人权宪章体系。该文件明确主张“信息自由流通”,规定“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发表意见和做出表示,不受干涉地保持意见,通过任何媒介超越国界寻找、接收和传递信息”。我国如何进行制度设计,需要认真进行研究。第二,通过研究,选择和设计合乎我国国情的

^① 崔保国、卢金珠等:《中国传媒产业发展趋势分析》,摘自《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崔保国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信息传播网络体系。如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有着各种选择。芬兰政府1951年制定法案，规定在知情权得不到满足时，当事人可向法院或其他政府机构要求得到文件。美国分别在1958年、1966年和1977年通过相关法律，规定联邦政府应将属于讨论性质的会议公开，会议通知须于一周前公布，会议记录可供公开发表。^①英、日、德、加等国家也制定了类似法案，以满足公民获知自由。西方不少国家的农场工人，可以一边在地里作业，一边洞悉“世界风云”：从机载显示屏上就可以方便地了解到国家政策、世界市场、气候交通、新兴科技等各种信息，哪怕种子已经落地，他也会根据信息指示，当机立断改种收益更高的农作物，从而保证“投入最小化，产出最大化”。第三，通过研究，探索农民在满足知情权的前提下主动参与市场、介入公共事务的运作模式与现实途径，为农民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和国家主人提供支持。

三

为了保证研究成果的可信度与效度，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文献法、问卷法、案例法和访谈法，对不同样本进行了深入研究，还采用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文件检索、实地调查、现场访谈、样本分析和逻辑证明等，希望通过采用多种方法来消除主观判断，提高成果可信度。

文献检索。在项目论证设计阶段和开始研究以后，本项目组通过对国家图书馆、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书单位的文献查阅，通过网络搜索和学术期刊文献检索，以及对有关著名专业涉农网站的浏览，将能够查到的相关文献尽可能收集齐全，分类加以梳理，确定本项目研究的逻辑起点。因此，本成果不是本项目组的独特发现与独立建树，而只是在前人辛勤劳动基础之上向前迈出的小小一步。如果说本研究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有所裨益，这也是在我国广大涉农学者辛勤耕耘、顽强探索精神的启发和带动下作出的一点小小贡献，是在涉农传播研究这棵参天大树上长出的新芽。

实地调查。为了保证研究覆盖的地域尽可能广，我们分别在东部、中部、西部选择了江苏省徐州市、河南省商丘市、湖北省天门市和四川省北

^① 梁枚梅：《从新闻的“知情权”看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媒介研究》2006年第7期。

川县作为调查对象，采取偶遇、随机、进村入户等方式发放问卷 105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005 份，通过 SPSS 软件处理，得到一系列重要数据，这些数据成为了本项目的研究基础和一些结论的重要支撑。在实地调研中，得到当地广大农民兄弟和各级党政干部的大力支持和有效协助，特别是 2008 年 8 月 22 日至 27 日，四川省北川县委宣传部面对抗震救灾的繁重任务，仍然为本项目组到该县擂鼓镇柳林村、茶坊村进行实地调查做出无微不至的安排，大大激励了我们做好该项目的决心与信心。2010 年 6 月在江苏丰县实地调查时，县委宣传部专门派出两位干部全程陪同并参与发放问卷、组织座谈会和现场访谈，为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令我们深感农村对信息工作的渴求和做好相关研究的沉重责任。

现场访谈。作为实地调查的重要补充，我们先后在北川县擂鼓镇柳林村、茶坊村，天门市张港镇毛岭村、高拐村，丰县县委县政府农委机关、师寨、华山、宋楼、孙楼、首羡、大沙河等有关乡镇访谈了近百名农村工作干部、农业技术人员、种植养殖大户、各种专业户、纯种田农户，还有若干贫困户，采用开放访问和专题访问相结合的方式，让访谈对象畅所欲言，自由表达，先后召开了 10 余次座谈会，和农民朋友、基层干部展开讨论，听取他们对构建农村信息保障体系与维护农民知情权的意见和建议。在丰县，我们还和县农委领导、县农技站专家、中华果都网、唐安果园网、丰县农业信息网等网站负责人和丰县电视台《农村天地》栏目负责人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得到了重要启示，使我们的研究方向和重点更为明确。

样本分析。在我们选择调研的样本县市中，除已升格为省辖直管的天门市办有《天门日报》外，其他地方均没有合法县报存在；所有电视台每天播出的自办新闻节目都在 15 分钟以内，其他时段主要为连续剧、音乐节目、综艺节目和大量的广告所占领，电视实际上充当着农民的娱乐工具；多数地方的广播要么早已不见了踪影，要么只是在村头装上一只高音喇叭向全村广播，传统入户的低音喇叭在农户家里难觅踪影，更不用说发挥作用。研究认为，农民信息供给的希望在于加快农村互联网的建设 and 有计划地办一批市场化的县报。随着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平台的建设，宽带网已经遍布乡村，一些地方已经接入农户家庭。我们对山东寿光门户网、江苏睢宁商业网、湖北天门政府网和江苏丰县中华果都网进行了考察，这些网站为维护农民知情权、提高农民信息意识、提升他们创造

财富的能力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比如寿光通过网络提供远程种植指导、对病虫害远程诊断、对市场行情实时动态更新，大大促进了该县蔬果品牌的形成与效益的提升；丰县系列专业网站外联市场，内联农户，把分散种植的大沙河苹果、宋楼油桃、师寨食用菌等集中推向市场，大大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投入产出效益，促进了品牌的形成与推广，深受农民欢迎。另外，尽管在几年前的报刊整顿中 300 多家县报被撤销，但在本次调查中发现，徐州所辖 6 县每县都有自己的报纸（无刊号），而且这些报纸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沛县日报》《今日丰县》《今日邳州》《今日睢宁》《新沂日报》等报纸以其政策的指导性、信息的贴近性、知识的实用性和使用的便捷性，深受当地农户的追捧，他们说，在使用新技术、推行新耕作方式时，可以拿着报纸“照单下料”，边看边操作，不像广播听不清楚，也不像电视看了就忘了，电脑也不能搬到田边地头，还是报纸好。

逻辑证明。学术研究离不开逻辑证明。本项目希望借助演绎、归纳、类比等逻辑方法，找到构建农村信息传播网络与提高农民媒介素养之间、农民媒介素养与满足农民知情权之间、维护农民知情权与激活农村创造财富的能力之间、农民创造财富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间、新农村建设与缩小城乡差别之间、缩小城乡差别与建设和谐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政府、媒体、教育和农民自身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动规律，做到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严谨求实，确保研究的深度与理论的高度，经得起质疑与推敲。充分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既有效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又力求对现有成果有所丰富，有所提升。

四

为了明确维护农民知情权的责任主体，为了梳理维护农民知情权和构建农村信息保障体系的相关思路，本项目研究分为十个专题进行。这十个专题分别是：“小康社会与三农问题”“信息社会与农民知情权”“农民知情权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关系”“维护农民知情权的国家责任”“维护农民知情权的地方政府责任”“维护农民知情权的媒体责任”“维护农民知情权的教育责任”“农民媒介素养与知情权的维护”“完善信息保障体系与涉农信息供给”“农村传播平台的构建与农民知情权的实现”。本项目对上述专题的研究难以穷尽所有问题，但希望提供一个基本的研究框架、解决思路和可供选择的操作模型，是否已经达到目的，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在本项目的论证和研究过程中，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谢常青副教授、陈红梅副教授、贾广惠副教授、王平副教授、关梅副教授、陈娟副教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方雪琴教授，中国文化报新闻部主任助理刘修兵各自作出了贡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方汉奇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吴廷俊教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方延明教授、段京肃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方晓红教授、顾理平教授以及江苏师范大学张文德教授、陈琳教授给予了大力支持。我的研究生闫志琴、邢长敏、艾文斌、葛宝进、张长晖、孟亚丽、薛婧等参加了丰县调查和数据处理，李洁、庄敏芳等同学参与了北川调查和有关数据收集、整理工作，江苏师范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 2006 级、2007 级、2008 级的部分本科生参与了调查问卷的发放、回收与数据统计工作。书稿由刘行芳、刘修兵完成，项目于 2012 年 12 月结项，证书编号为 20121636，结果为良好。

刘行芳

2013 年 3 月于江苏师范大学云龙校区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小康社会与三农问题	(1)
第一节 小康社会:民族复兴的阶段性目标	(3)
第二节 从三农信息化着手,破解实现小康的现实难题	(26)
第三节 农村信息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48)
第二章 信息社会与农民知情权	(53)
第一节 数字技术改变社会生活	(55)
第二节 信息社会与农民媒介接触	(62)
第三节 信息社会与农民知情权	(69)
第三章 农民知情权与其他权利之间的关系	(84)
第一节 农民知情权的法律审视	(85)
第二节 知情权在我国实践	(102)
第三节 知情权与人民当家作主	(114)
第四章 维护农民知情权的国家责任	(134)
第一节 维护农民知情权任重道远	(135)
第二节 国家责任的基本构成	(143)
第三节 实现国家责任必须破解现实难题	(151)
第四节 以社会合力破解三农难题	(157)
第五章 维护农民知情权的地方政府责任	(161)
第一节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	(161)

第二节	服务公众是政府转型的核心	(168)
第三节	维护农民知情权地方政府责无旁贷	(174)
第四节	维护公民知情权的有益探索	(183)
第六章	维护农民知情权的媒体责任	(200)
第一节	媒介与农民的鱼水关系	(200)
第二节	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211)
第三节	媒介是实现农民知情权的社会机制	(216)
第四节	政府、媒体与农民的信息互动	(220)
第七章	维护农民知情权的教育责任	(225)
第一节	教育在提升农民媒介素养中的责任	(226)
第二节	教育在培育新型农民方面的责任	(239)
第三节	教育在维护农民知情权方面的责任	(249)
第八章	农民媒介素养与知情权的维护	(257)
第一节	农民媒介素养是实现知情权的前提	(257)
第二节	我国农民媒介素养现状	(266)
第三节	我国农民的信息应用	(274)
第九章	完善信息保障体系与涉农信息供给	(278)
第一节	完善我国农村信息传播体制	(278)
第二节	优化我国农村信息供给体系	(288)
第三节	打通我国农村信息传播渠道	(295)
第四节	丰富我国农村信息传播内容	(304)
第十章	农村传播平台的构建与农民知情权的实现	(311)
第一节	补齐农村信息传播平台短板	(311)
第二节	完善农村信息传播平台建设的顶层设计	(316)
第三节	农村信息传播平台的建构模式选择	(324)
第四节	多种传播媒体与传播方式的综合应用	(334)
第五节	立足便捷实用,搭建服务平台	(343)

第一章 小康社会与三农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亿万农民热切期盼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认真解决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一个农村居民占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国度，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因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也就成为国家建设小康社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城市化水平过低，媒介资源的两极分化和信息分布的严重失衡，造成农民发展空间的萎缩与上升通道的阻塞，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亟须解决的现实课题。据统计，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5.8%。这里的“城镇”，既包括京沪穗这样的一线大都市，也包括山区小镇、边陲乡镇。相对于欧美高达80%的城市化率，我们的发展是严重落后了，农村人口还会长期成为我国的主体。而且，农民的收入低下，2009年城乡收入比为3.5:1。^①

贫困人口绝对数较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均衡发展。在2010年8月17日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105位左右。而按照中国人收入1300元的贫困标准线，全国还有4000多万人没有脱贫，其中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②

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3月公布的数据，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比上年增加1.9%。^③这意味着，我国有2亿以上农民长年漂

① 余森杰：《中国“依靠内需”仍是望梅止渴》，《金融时报》2010年8月19日。

② 《商务部回应GDP总量超日本：中国4千万人未脱贫》，《北京晨报》2010年8月18日。

③ 刘铮：《统计局：中国农民工人数将达2.3亿月均收入1417元》，《新华网》2010年3月24日。

泊在外，过着异地打工的生活，他们无论从精神上、生理上，还是从健康的社会交往方面，都存在不容忽视的苦恼与困惑。

包括知情权在内的公民的各项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这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农民总是处于信息孤岛之中，无法了解社会变动的各种真相，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灾害也总是更加容易加害于他们。2008年汶川地震共有87150人遇难，374643人受伤，另有17923人失踪，^①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民兄弟；2010年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截至4月25日下午17时，已造成2220人遇难，失踪70人。^②2010年8月8日，甘肃舟曲突发泥石流灾害，据舟曲灾区指挥部消息，截至8月22日，在舟曲“8·8”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中遇难1435人，失踪330人，^③其主体也是当地农民。

三农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不单单是中国所特有。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三农问题有中国这么突出，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有这么深远，解决起来有这么困难。更不会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需要将三农问题当作与国家大局紧密联系的战略任务来加以部署，需要投入这么大的精力、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加以解决。

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特殊，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基础薄弱、经营分散、耕作原始、容易受自然气候、国家政策、市场供求关系等诸多外部因素影响和制约外，农业人口众多、农业经济脆弱、农业科技水平偏低、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强，农民在观念上的封闭保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缺乏基本的信息需求欲望与获得信息的渠道不畅或缺失等内生性矛盾更是其主要原因，这也决定了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必然超乎人们的想象。

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以发展农村经济（主要是高效农业）为抓手，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在21世纪中叶基本建成小康社会。^④因此，能否构建四通八达、纵横交错、使用

① 《87150：遇难人数统计艰难行进》，《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5月30日。

② 《玉树地震造成2220人遇难失踪70人》，中国新闻社，<http://news.hexun.com/2010-4-26/123531864.html>。

③ 姜伟超、王志恒：《舟曲灾区遇难人数上升至1435人》，<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2508096.html>。

④ 王国立：《如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

便捷的信息传播网络与信息供给体系，能否满足农民知情权，发挥广大农民的聪明才智，把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出来，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市场的主体和国家的主人，从传统的输血型、救济性的扶贫方式转变为造血型内生性的创造财富方式，推动三农问题得到真正彻底的解决，直接决定我国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实现进程的快慢和水平的高低。

第一节 小康社会：民族复兴的阶段性目标

以宗法观念为特征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特别是封建统治集团全力推行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严重扼杀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活力，制约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而清朝政府选择的闭关锁国政策，更是使我们这个曾经创造过无比辉煌成就的文明古国，在近百年来大大落到了世界的后头。晚清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停滞，科技落后，信息不畅，文字狱盛行，加上帝国主义的肆意欺凌，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库亏空，国力衰微，民不聊生，盗贼蜂起，民族生存处于危亡境地。

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激励和启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先行者举起“推翻帝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大旗，掀起了一波一波革命浪潮，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但孙中山领导革命斗争，尚未充分认识到发动农民群众的重要性，而是以组织革命军队、武装夺取政权为主要斗争策略。在广大农民并不知情、缺乏参与热情的情况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最终无法完成其既定使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他在“临终遗言”中深刻反思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①

尽管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未能最终实现其目标，但由孙中山先生点燃的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则在中华大地逐渐形成燎原之势。在波澜

^① 孙中山遗嘱，<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4&treeView=1&view=2&id=96762053>。

壮阔、风起云涌的社会大变革中，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无数革命先烈经过浴血奋战，最终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打击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帮助农民学习文化，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千方百计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并跟上世界革命的脚步，这对于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建立人民共和国之后，我们沿用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及苏联的经验，将小农经济视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加以限制，认为组织规模愈大，愈能提高生产效率，只有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最后发展到人民公社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并不断扩大基本核算单位，开始是生产队，后来过渡到生产大队；将集体生产组织提升到是否是社会主义的高度加以规定。1953年，毛泽东表示：“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①一场连绵数十年的史无前例的集体化运动从此开始。而互助组、合作社到后来的人民公社被视为唯一正确的集体化组织形式。^②尽管通过土地改革、实现农业生产合作社及之后开展的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我国农村面貌有所改观，可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农民和农业面临的诸多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国家建设的艰难程度估计不足，偏于乐观，以为建设社会主义可以手到擒来，一蹴而就，甚至轻率地提出“十五年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激进口号；另一方面是面对帝国主义的层层封锁、四面围剿和国内种种颠覆势力的威胁，维护和巩固政权成为最大的任务，“对于农村这块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定去占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被当作普遍价值观念予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妇孺皆知；一些行之有效的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基本制度和管理措施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农民被高度地社会化和严格地组织起来，他们的智慧和创造财富的热情受到极大伤害，我国解决三农问题陷入困顿之中。

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提供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② 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了一条新的思路，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从此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的征程，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千方百计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把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从此掀开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篇章。^①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回顾中国农民在旧社会饱受压迫的艰难岁月，回顾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翻身求解放的奋斗历程，客观评价我们在解决农民问题上走过的曲折历程，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为何要选择今天这样一条道路。

一 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农民

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一样，也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若干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是，在中国未能出现“资本主义社会”。19世纪40年代以后，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依然处在这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之下，他们根本无法享有包括知情权在内的各项基本人权。

1924年1月20日至23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由孙中山主持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特别关注到农民问题，“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孙中山希望或者通过国家“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或者采取“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②

但是，这些美好的构想并未能够变为现实。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旧中国，始终处于腥风血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支

^① 《十一届三中全会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6日第1版。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http://www.sysu.edu.cn/sun/YFhall/workn_cont.html。